

中国现代史

(中册)

徐锡祺

北京教育学院

1991年10月

第七讲 政治上“左”倾错误的发展

一、1959年庐山会议

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—8月1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—16日八届八中全会的合称。前后计了一个半月。按照会议进程可分为二个时期三个阶段：

前期 1959年7月2日—23日，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教训，继续纠正“左”倾错误。

后期 7月23日—8月16日，错误批判彭德怀。

1、庐山会议前期——会议第一阶段（7月2日—7月15日），纠“左”。

7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原定会议15天。任务是总结纠正1958年以来“大跃进”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“左”倾错误，讨论下半年和今后四年的经济工作任务。

会议一开始，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，并讲了自己的看法：

① 读书。他说，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，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，所以应当好好读书。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，或实行干部轮训。中央、省市、地委一级读苏联的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》（第三版）下卷。县社干部读《好人好事》、《坏人坏事》、和中央各种指示文件（加省市的）三本书10万字，10天读完，还要考试。

② 形势。毛泽东把国内形势归纳为“成绩伟大，问题不少，前途光明”。主要经验是：综合平衡，群众路线，统一领导，注意

质量。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。

(3) 任务(分成两个问题,即今、明年任务,四年任务)。去年强调了工、重、交,挤掉了农、轻、商。现在应农业挂帅,其次是轻,把重放到第三位。工业要支援农业。过去陈云提过,先安排好市场,再安排好基建,这是对的,日子过得舒服,才利于建设,便于积累。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。能超就超,不能超就算了。钢明年只能增400万吨。去年做了件蠢事,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。

恢复农业四十条,还是12年达到。15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坐待。总之要量力而行。人的脑子逐渐实际,要让下面去超过。

(4) 权制。对下要适当控制。人、财、高、工四权要适当收回来归中央。强调集权,统一领导。统得不可不死,不可过死。

(5) 食堂。按人定量,分配到户,自愿参加,节余归己。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,不要一哄而散。

(6) 学会过日子。要留余地,留日子当穷日子过。要增产节约。

(7) 恢复三定:定产、定购、定销,三年不变。

(8)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。

(9) 综合平衡,大教訓之一。要搞好农业本身(农林牧副渔等)、工业内部、工业与农业三个平衡。无综合平衡,即无群众路线。

(10) 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。

(11) 农村党的作用。

⑫ 宣传问题。

⑬ 质量问题。

⑭ 对去年的估计：有伟大成绩，有不少问题，前途是光明的。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。

⑮ 群众路线。

⑯ 全国协作关系。

⑰ 团结问题。

⑱ 国际问题。（第三个问题任务分成两个问题，则为19个问题）。

会议从7月3日开始，按大行政区分为六个组进行讨论，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分别参加各组活动。在讨论中，各人摆情况，谈意见，边开会，边学习，自由交谈，各抒己见，轻松愉快，生动活泼，没有一点紧张气氛，大家称之为“神仙会”。

7月4日，刘少奇参加中南组讨论。说：58年跃进，吃了57年库存，预支了59年。因此59、60年都要补课。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，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。对去年问题，当前形势，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，因为有了教训，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。他要大家不要泄气。革命就要出问题，不能怕出乱子。很明显，这是刘少奇以“革命”的名义，来为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辩解。

6日上午，朱德在中南组讲：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。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。办公共食堂，对生产有利，但消费吃亏。他主张：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，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。他提出：要让农民富裕起来，不会成富农路线。这是有关五亿人口安定的问题。

彭德怀参加了西北组讨论，从3日至10日先后作了7次发言。这几次发言内容是：

〔3日〕他向大家介绍了他考察10个省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。当谈到湖南情景时说：“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，去年报的增产数，实际没那么多嘛。我去了解了，实际只增产了13%。我又问了周小舟（湖南省第一书记），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%，就这个数字也靠国家给了不少贷款和补助。前不久，主席也去过这个社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你了解怎样？他说他没有跟他们谈这个事。我看他是谈过的！何必隐瞒呢？是什么就是什么嘛。”

又说：“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，政治上、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，党的威信高了，得意忘形，脑子热了点。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，不要丢掉了，但不要埋怨。

“从北戴河会议以后，搞了一个‘左’的东西，‘全民办钢铁’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？全民办工业，限额以下搞了一万三千多个，现在怎么办？每个协作区，省要搞工业体系，不是一、两个五年计划的事情。”

“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，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，还没有充分发挥，就公社化，而且未经过试验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，就好了。这也不是说等他衰老。居民点上半年才修下，下半年就拆，使战略口号当成当年的行动口号。公社没有一个垮的，但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。”

〔4日〕他在全面批评了“浮夸风”、“官僚主义”、“全民办钢铁”、“高指标”的宣传后说：

“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，吃饭不要钱

那么大的事，没有经过试验。总之，大胜利后容易热，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。

“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，因为党的威信提高，群众信任，因此，行政命令多。

“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做到，如除四害；但与人民利用相违背的事（如砸锅），在一定时候也可以做到，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。

他强调：“要找经验教训，不要埋怨，不要追究责任。人人有责任，人人有一份，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。我也有一份，至少当时没有反对。总的责任在中央，不在下面。”

〔6日〕彭德怀在小组会说：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容易产生右的错误，与资产阶级决裂容易犯左的错误。

“我们党内总是‘左’的难纠正，右的比较好纠正，‘左’的一来，压倒一切，许多人不敢讲话。成绩是伟大的，缺点是一个短时间（9—11月）发生的，而影响不只三个月，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。把问题搞一致，就团结了。”

〔7日〕“大家目前议论最多的是‘官僚主义’，群众对官僚主义敢怒不敢言！没有官僚主义，就没有‘特殊化’，就没有‘瞎指挥’，就没有‘浮夸风’！农村四个月不供油，能办到吗？完全是主观主义！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，就打电话提意见。你们提了没有？抵制了没有？

“我在外地考察，看到一些风景区被列为禁区。听服务员说，那些小楼是专给中央来的首长准备的，哪一级住哪一层都有规定，

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。夜里我睡不着觉，就围着那些空楼转。心想，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、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，还怕人家不知道，在这儿修了当年帝王将相的殿堂庙宇咧！看到它，我们的人民会怎样想？不骂娘？

“过日子，国家也要注意，风景区，人工湖可以慢点搞，浪费很大，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，搞什么名堂？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？为什么搞了？这个问题值得深思。”

〔8日〕彭德怀说：“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，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。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，是全世界找不到的，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。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，问题不少。”

“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，北戴河会议不批判‘吃饭不要钱’结果普遍推广了。”

〔9日〕“解放以来，一连串的胜利，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，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。在大胜利中，容易看不见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。”

又说：“‘左’的一来，压倒一切，许多人不肯讲话，一讲话，什么算帐派、观潮派、怀疑派等帽子都来了，这对广开言路有影响。有些人不说真话，摸领导的心理。这个作风已经带进了我们党内……”。

〔10日〕“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，省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？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，而是个人决定，第一书记决定的算，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。不建立集体威信，只

建立个人威信，是不正常的，是危险的。”

“‘浮夸风’、‘小高炉’等等，都不过是表面现象，缺乏民主、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……”

彭德怀这7次发言，归纳起来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：

- ① 在胜利面前，要注意防止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。
- ② 要注意经济发展规律。
- ③ 纠左比纠右更难。
- ④ 人民公社办早了。
- ⑤ 发扬党内民主。

彭德怀的这些是完全正确的，但他也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，如刘庆施一伙，于是他们抓住机会告“御状”。

从8天的讨论中，大多数人赞成总结经验，继续纠“左”。有些部委和大区及省（市）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。但有一些人护短，认为“左”的错误已纠正差不多了，现在再纠“左”就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，出现了右的错误。

在讨论中，对下面三个问题有不同看法：

- ① 对“大跃进”所造成的形势怎样估计，成绩是主要的，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。
- ② 对前一段纠“左”成绩怎样估计，纠得够不够。
- ③ 现在的任务是什么，是继续纠“左”还是反右。

10日晚，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，讲了话。他说：“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，就不能团结；要党内团结，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。”

“对去年一些缺点、错误要承认。从一个局部、一个问题来讲，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、九个指头的问题；但从全局来讲，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，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，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。成绩还是主要的（彭老总说〔指缺点〕一个指头多一点）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“北戴河以来，虽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，但总是抓工业了。一年中有很多经验，我负有责任。

他还说：“我们这一年来的会议，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，加以解决。大家要记住：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。经常分析问题，脑子不要僵化，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。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，不在制定之时，而在执行之后。过去的革命路线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。现在的建设路线，要再看十年。有些得不偿失问题，要付一定学费。许多事要取得经验，总得出学费。

从毛泽东的讲话，看到他确实是要大家冷静下来，要承认去年确实出现了失误，存在不少问题，有待一个个解决。讲话中还提到彭德怀的看法，可见对彭德怀尚无戒心。那时的大问题是必须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。

11日晚上毛泽东又找了周小舟、周惠、李锐谈话，说：提倡敢想敢干，却引起唯心主义，“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”。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，怪各部门，否则，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：曹营之事，难办得很。

又说：关于敢想敢干，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，还有钱学森的文章（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九，就可能产万斤），捷报不断

传来，当然乱想起来。“许多事我都要负责，有些也真负不了。”

这夜谈话时纠“左”的许多看法，比头天在组长会上的讲话还要明确。也就在这次谈话，周小舟直接批评了毛泽东，说“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，主要怪上面。哪里有什么万斤亩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‘书记挂帅’权力太大。”毛泽东听了这个批评，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，反而更加谈笑风生。

毛泽东讲话之后，会议继续分组讨论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》，并准备在15日结束。

《庐山会议议定记录》是胡乔木、谭震林、曾希圣、周小舟、田家英、李锐等起草的。内容是：形势和任务、读书、宣传问题、综合平衡、群众路线、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、体制问题、协作区和协作关系、加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的领导作用、过日子问题、公共食堂等12个问题。

《记录》在“形势和任务”部分对“大跃进”产生的缺点和错误作了一定的陈述后指出：产生“大跃进”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，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估计和认识不足，没有完整的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；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的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。《记录》强调：在肯定成绩之后，对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，不要怕说缺点。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，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，应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，不要采取粗暴武断的办法，不要随便扣帽子。《记录》还提出1960年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，工农业的发展应在作好综

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。

15日，会议分组讨论《记录》草稿。一些坚持“左”倾观点的同志对《记录》关于“形势和任务”的分析提出了基本不同的意见。他们认为《记录》对“大跃进”的成绩估计不够，对缺点讲多了，特别对《记录》说到没有认真总结苏联和我国建设的经验的那段话有反感。他们提出，应充分肯定“三面红旗”的伟大成绩，强调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，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已经纠正了。他们主张到1962年，我国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数量要赶上和超过英国。

应该说这半个月的会议情况基本正常，各种意见都可在会上发表。讨论《记录》草稿时，两种不同意见明显尖锐起来了。

会议第二阶段（7月16日—7月23日）发表彭德怀的《意见书》开展对彭信的评论。即纠“左”向反右过渡。

在前一阶段的讨论中，应该说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问题的空气不是很浓的。有一些人护短，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，不能虚心地倾听对“大跃进”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，把“神仙会”变成“护神会”。当毛泽东7月10日讲话后，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存在的严重比例失调和“左”的问题认识不够，对毛泽东提出的“问题不少”没有议透，因而非常忧虑，认为如果“主席再重新提一下两条腿走路的方针，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”。

13日晨彭德怀去见毛泽东未见着，又担心会议匆忙结束，故当晚起草一封信，找人抄清后，14日送毛泽东。

彭德怀的信分为两部分：

第一部分标题是“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”。在此他列举了工农业生产增长的统计数字，说明成绩是伟大的。他也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，经过一系列会议“基本已经得到纠正”。在说到全民炼钢时，“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，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，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。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，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，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。”因此可以说是“有失有得”。

信的第二部分标题是“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。”他认为：现在“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，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。就其性质看，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、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，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”。

“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，没有完整的经验。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，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，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。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，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、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。”同时“过去一个时期，在我们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，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”，这主要是：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，使我们容易犯“左”的错误。他在信中说：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，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，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激情所迷惑，一些‘左’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”，“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”。在思想方法上，“往往把路线性的布局和具

体措施，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。全体与局部，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。”他认为“纠正这些‘左’的现象，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，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。”要彻底克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，“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。”

在信的结尾，彭德怀写道：“我觉得，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，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，甚有益处。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，提高思想，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。反之，是不利于党不利于事业的。”

彭德怀的信是写给毛泽东“作参考”的，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。从信中所谈的内容看，态度也是真诚恳切的，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，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。从字面上看，这封信虽没有直接否定“三面红旗”，但已表明他对“三面红旗”抱有很大怀疑，虽没有公开讲毛泽东的错误，但在指导思想上提出要清算主观主义的问题，这是毛泽东很难接受的。

毛泽东显然对彭德怀的信有看法。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“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”的标题，批示“印发各同志参考”。同时通知在京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彭真、陈毅、黄克诚、安子文等也上山来参加会议。在当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，（毛、刘、周、朱参加）毛泽东提出：“我建议要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”。

7月16日，各组人员打乱，重新编组。（周小舟等建议，使

之不成体系，免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，问题展不开）从17日起开新的小组会。并传达了刘少奇16日在常委会上的发言“成绩讲够，缺点讲透，鼓足干劲”。

头三天小组会，对《议定记录》稿与彭德怀的信的意见，发言者如加涉及，大体是同时谈到的。后来两三天，即到22日下午为止，如果涉及，就只是对信的评论了。在讨论彭信中，有相当多的人赞同信的看法，有些人基本赞同，但对某些提法不赞成，也有少数人认为彭信在总体的估计上是错误的，明确提出反对。彭德怀自己估计：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的，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，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。这个估计大体符合实际情况。

19日，黄克诚在第五组发言，他没有谈彭的信。在谈到公社问题时说：公社“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？我想，搞也可以，不搞也可以，从长远说，搞了好；从短时期说，不搞更主动些”。他同意缺点要讲透，有缺点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。在发言中，他还指出去年兴铺张浪费之风。对彭信，18日他对周小舟等人到讲过，他说粗看了一下，有漏洞，有问题，还有刺；照实际情况，还可以说得重点，但这话不能对彭说。

周小舟19日在第二组发言，他认为：庐山会议是向级干部会议，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，应该着重总结经验。“只有把缺点讲透，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。缺点少讲，或者讲而不透，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。”至于“彭总给主席的信，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，我是同意的，至于某些提法、分寸、词句，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。”

张闻天的发言是7月21日在第二组作的。这时对彭德怀的信非难已经很多，说这封信的矛头主要是“针对着毛主席的”，说法已经传开，形势已比较紧张。但张闻天仍以鲜明的态度、确实的事实、科学的语言，来支持彭德怀。

关于“大跃进”的成绩，他认为应该说够，工农业生产、文化教育、科技都有跃进，应该肯定，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，解放思想、鼓足干劲、反对保守，确实创造了许多奇迹。

关于缺点，他认为讲透很必要，他针对一些人认为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了就不必讲了的看法说，这不对。事后诸葛亮，事后问题看得更清楚，回过头来严肃认真地总结，印象才会深刻。

他指出：大跃进、公社化的缺点主要是（1958年）9月以后。指标太高，求成太急，比例失调，造成很大损失，首先是钢铁指标太高，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，对1958年粮食估计过高，也造成损失，发生了经济上一系列的问题：基建太多，拉得太长，资金积压，材料分散，浪费很大；招工二千零八十万，人浮于事；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；许多企业，原材料缺乏，经常停工待料。还有共产风造成的损失，放开肚皮吃饱饭，一平二调。工农业比例失调，反映到市场上供应紧张，在财政金融上表现出来，物资缺乏，货币回笼不了，造成增发钞票。

问题产生的原因，主要是缺乏经验，但作为研究总结经验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，应从思想、观点、方法、作风上去探讨。主观主义、片面性。好大喜功是好的，但也要合乎实际，否则会弄巧成拙，欲速不达，好事变成了坏事。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是对的，但要很

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，光挂帅不行，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，它与政治、军事的规律不一样。搞经济工作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，是要吃亏的。要搞经济核算，要算今年，而且要算明年。要取消吃饭不要钱，缩小供给部分。

党内民主作风问题，光不怕杀头不行，问题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、环境，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，生动活泼，大家交换意见。决不能为了讲几句不同意见，就给加上种种帽子。

缺点讲透很必要，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的态度。胜利一个接着一个，使人头脑发胀，骄傲自满，问题也就随着产生，这很值得警惕。

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么样？还要等待事实来证明，现在不要吹。农业增产是否每年都能经常增加10%，也要研究，要多想办法，不能骄傲。

对彭德怀信，他说：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，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，本意是很好的。他说成绩是基本的，同大家说的一样，个别的说法，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。比如，“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”，这话是对的。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不正确要看十年，他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，这没有什么估计不足。

对于得和失的看法，他讲的是局部问题，有得有失，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上看，是强调成绩，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，考虑一下是可以的。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，是具有政治性的说法，我认为要看怎么讲，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，现在已基本好转，

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，人民内部也有矛盾，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考虑。

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，吹遍各地区，各部门。各地区、各部门情况不同，是不平衡的，他可能讲得严重一点，但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，现在也不是完全解决了。

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”，使我们容易犯“左”的错误，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，这个问题不说更好一点。

至于说“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丢诸脑后了”，我认为如果讲一个时期，这样讲问题不大。

至于纠正“左”的偏向要比纠正右的偏向还要困难的问题，有的说容易，有的说困难。“左”的毛病我犯过，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，现在是局部问题，不是路线问题，所以性质不同，比过去纠正错误肯定容易。但容易到什么程度，还要看我们工作做得怎样，抓得紧就容易，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。

后来批斗他时，说他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“全面系统的发挥”，是“进攻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”。有人让秘书作了统计：全文8000多字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，用了39个“但”字（但字前虚晃一枪，以后便大作文章），13个“比例失调”，12个“生产紧张”，108个“很大损失”（或损失），以及“太高”、“太急”、“太快”、“太多”等大批“大”字。

在讨论中，反对彭德怀的人，认为彭信夸大的缺点，否定了成绩，不符合实际，有埋怨泄气情绪。他们认为党的总路线完全正确，